

# 大院里的晋商

乔忠延



渠家大院 (来源：百度)

的防御思维带回家乡，代代相传，筑堡成院成家，在古代民居中独树一帜。

万荣李家则借助了汇通“三边”的良好机遇。“三边”，即靖边、安边、定边。这一带土地贫瘠，气候寒冷，不能种植棉花，土布缺少，价格很高。李文炳看到了这个商机。清道光三年（1823），在家乡收购土布，组织马帮，运往“三边”。再把西北的皮货、药材贩回内地，财源滚滚。李家商号先是向西拓展，而后向东、向南挺进，发展到武汉以及沿海的上海、天津多地。100多家店铺，覆盖了15个省市、40多个县。据说，李家媳妇王和君接手“敬义泰”生意后，每年巡查各地商号，从闫景村坐马车出发，每天行程60里，只住自家店，不吃别人饭，可以直到银川城。

走遍山西大院，唯有李家大院别开生面。那门楼外形轮廓，不仅仅高，不仅仅直，而且还尖，似乎直冲青天。这线条如此轻快，这造型如此挺秀，确实少见。是少见，这是十六世纪欧洲“哥特式”建筑体式。别看这“体魄”像是洋

人的个头，外在的“服饰”却是本土特色。砖雕的大善字是传统的，砖雕的图案花纹是传统的，这不就是立体的中西合璧、文化融合吗？毫无疑问，李家大院就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整座大院渗透着博采众长的理念，北方屋舍的本色里，夹杂着一些徽派元素，夹杂着一些欧洲风格。其特点是，精致大宅门通天接地，传统四合院藏风聚气，欧洲式风格渗透形体，徽派样风味增添情趣。

李家大院的新异，在于李家传人李子用曾经留学英国，把西式建筑风貌带回了家乡。何止是带回了西式建筑，还带回了英国媳妇麦克蒂伦，带回了工业时代的新思维。李子用着手办起炉院，铸造五齿铧，风齿铧，柳叶铧等新型农具，铸造笼圈、铁锅、鳌子、篦子等新式灶具。这还只是小打小闹的尝试，继而李家在上海、天津、武汉的申新纺织公司、中纺公司、大华纱厂也相继开业。

那个时代的晋商步履，不只是遗留在史料里，故乡的大院里也垒砌着不可磨灭的印记。

## 昔日太原“元旦”

彭庆东

“元旦”，在民国以前，就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春节”，是一个非常中国风的节日。

根据《说文解字》可知：元者，始也；旦者，明也。元旦，就是一年开始的第一个早晨。据说，“五帝”之一的颛顼确定农历正月为元、初一为旦，合称“元旦”。虽然此后夏、商、周等朝代对于把“元旦”放在哪一天各有所好，但还是以每年的第一天为准。直到汉武帝时，元旦才被固定为农历的一月初一，之后到民国元年一直未变。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此处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为公元1912年1月1日，也就是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农历正月初一的元旦称号，挪到了公历1月1日，后又将旧历元旦改称为“春节”。因此，1912年1月1日就成了中华民族迎来的第一个公历元旦。

公历元旦对于传承了上千年农历习俗的民众来说，是个新鲜事物，如何才能让人们接受并沿用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元旦放假，商家促销”。公署机关带头放假，社会团体放假，然后银行放假，学校放假，有放假三天的，也有两天的，并不统一。放假期间，公署还张灯结彩，举办宴会，等等。

虽然官方极力为民众营造分享阳历元旦的欢乐气氛，但民众并不买账，甚至视元旦为“洋节”，一副待理不理的样子。著名地方史学者、太原晋源区赤桥村的刘大鹏先生就在其日记里多次记载了太原当地民众对元旦“喜旧厌新”的情景：对于新历，在官之人往往挂红结彩，休假致贺，而民间却不以为意，令刘大鹏深感“民情不顺逆”；而每逢旧历元旦，民间则家家户户无不按照旧俗，大张旗鼓地庆贺新年，仍旧“鸡鸣而起，爆竹焚香，张灯结彩，迎神逐祖，虔诚祭祀”，场面热闹，灯火辉煌，宛若白昼，初七唱戏、初八开市等“旧年之事”也依旧遵行不废，以致“各处官长亦皆无如之何，听民之仍旧度年也”。

这让民国政府很是尴尬，于是在1929年初颁布禁令，禁止所有人过农历春节，并把祭祖、年夜饭、敬财神及元宵节等活动统统挪到阳历1月。刘大鹏的日记也记载了当年太原那个春节的情形：“今日元旦，只闻寺庙敲钟报晓，庆贺新年，不闻街市纸炮之声，由于省城警察厅致各县公文，禁止民间燃放纸炮以及一切枪炮也。”其结果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官界皆行阳历，民界皆仍为行阴历，以寅月（正月）为岁首。”这里所说的“元旦”仍是指农历的“春节”，除了寺庙的报晓钟声，太原的乡村寂静无声。显然，禁令过于激进，弄得元旦、春节两

不愉快。1934年，民国政府不得不取消了这项禁令，元旦、春节各过各的，互不干涉，这才彻底形成了元旦和春节“分家”的局面。1935年出版的《太原指南》即是这样记载：“太原俗尚，新历元旦，仅机关学校放假，一般商民，应用者较少，故风俗多沿用旧历。”

面对早先元旦、春节的“纠结”，商家则“犹抱琵琶半遮面”，既不得罪官面，也不结怨民俗。起初逢阳历元旦，商家用阴历贴春联的习俗来庆贺，广告也冠以本店名号向大众“恭贺新禧”，抑或宣传一下本店所售的商品，以此应付一下“庆贺”场面，却很少有与新年元旦挂钩的降价促销活动。直到1927年，阳历元旦才迎来了大规模促销的商机，其促销策略与今日无异，但阳历元旦却登上了具有时代气息的广告宣传画。商家把广告宣传画制作成精美的日历，正面的商品多辅以时髦女郎为背景，背面按序排列了民国年号、公历及阴历等日期，时人称之为“月份牌”。月份牌随商品免费赠送，刺激人们消费的同时，也让新年元旦渐入人心。

烘托新年元旦气氛的还数戏剧“贺岁档”。民国之初亦有“贺岁”戏，只不过“贺岁”戏所贺之岁还是阴历，打广告所用的日期也是阴历。当阳历元旦被世人所接受之后，戏剧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贺岁档”，这对太原戏剧繁荣无疑也是一个福音。元旦之夜，各大戏班子的名角大腕纷纷亮相于省城的茶楼、戏园，这比大年三十可红火多了，因为大年三十太原人都围炉守岁，没有演戏的，也没有出门看戏的；有的戏园专程邀请外地名家来太原演出，1934年的元旦节刚过，著名京剧艺术家李万春就应邀来太原公演十天，延续元旦“余热”，位于柳巷的中华大戏院门前一票难求，可见太原票友们对“贺岁档”的痴迷热情。当电影传入太原后，具备放映条件的也就三四家电影院，虽说普通民众看电影相对于看戏听书来说还是高档消费，但上座率仍然可观。即便如此，元旦之日，位于南仓巷的山西大剧院还要刊登电影广告，并赠送电影明星画报，图的就是影院门前的红火热闹。“贺岁档”增加了人们对新年元旦的快乐感和仪式感，也增加了人们对新年元旦的认识。

尽管百年前的太原人对元旦认识有差异，但并未影响大家憧憬美好生活，新年代表着希望，过两个新年又有何妨！

晋民俗

## 永济饺子

格格

牛肉饺子是运城市永济的一种民间小吃，相传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由于当地回民喜食牛肉，为保持传统和正宗的味道，他们一般自己养牛、宰杀，或出卖或自己食用。而晋南人喜食饺子，慢慢地，当地回民就用精纯的牛肉做馅，用熬制的牛骨头汤拌馅，制作牛肉饺子，吃起来鲜、香、嫩、滑，回味无穷。

永济牛肉饺子有“四怪”：一是“擀面轱辘一猛通”，意思是说，小擀面杖两头中间一样粗。二是“饺子皮儿对对出”，擀皮同时擀两个，包饺子时用一只手完成，另一只手在盛馅儿，那速度，用“飞”来形容实不为过。三是“大碗不用手来端”，饺子煮熟后，用一个铁匙做的两个圆弧相对的卡子把大碗卡住呈上来，可以在离饭桌较远的地方把碗稳稳地放好，避免桌上人多的时候还得起身相让；同时，因为服务人员不用手端碗，可避不讲卫生之嫌，也不会烫手。四是“永济饺子泡着吃”，永济的饺子是用汤泡着吃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水饺。



晋之味

我们村是晋源区五府营村，村东原有一条大河，此河呈南北走向，但却曲曲弯弯的，从南屯到野庄、王郭村，绵延几十里，人们称为县河。河堰厚实高大，长满了树木杂草，平日里栖息着野兔、獾子、野鸭等动物。

既称县河，便可知道是当初县衙门主持开凿、造福全县人民的水利工程。据老人们说，县河开凿于明代。那时候，土地都是个人所有，开新河是要占用土地的，占谁的地谁不高兴。县令便按那时约定俗成的规矩，派上衙役，骑着马，从设计的河头跑到河尾，留下马蹄印处即是河道的中心线，叫做“跑马征地”。听天由命，谁有意见也没办法。征地的日子是预先通知下去的，到了那天，家家地头都有人守护着，马跑过来了，人们就尽量把马赶离自己家地头，于是那马就左冲右突地一路跑下去，便跑出了这条曲里拐弯的县河。

还有一个小插曲：县河是从南屯村之东的汾河进水，马当然是从那儿开始跑。谁料刚开跑，有人就赶，马猛不

金朝末年，蒙古大军南下，金朝的中都（今北京）已经不适合再作为都城了。到了金贞祐二年（1214），金朝大臣中主张迁都的呼声很高，有人建议迁都河中（蒲州），因为河中部地区背负关陕五路，土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台以为右翼；前有绛州、平阳、太原三大镇，敌兵不敢轻入；让三镇郡县之民皆据守山寨，在敌军进攻时，昼攻夜劫；屯重兵于中条山，朝廷在河城中城有完全之固。因而，迁都河中有地理上的天然优势。后来，有人认为河城中城靠近黄河，又没有现成的宫殿建筑，所以建议把都城迁往汴梁。从当时的迁都之议，可以看出河城中城重要的军事价值。

金朝迁都汴梁后，对河中的防御十分重视，金贞祐五年（1217）前后，诏令元帅都监阿禄带驻守河中。阿禄带不善带兵作战，在河城中城外修筑了许多战壕。北面的绛州城破之后，阿禄带十分害怕，上奏朝廷说河中孤城不可守，不要留下来给了敌军，建议实行焦土之策。结果，阿禄带下令放火焚城，大火烧了两天。当时金朝准备放弃河城中城，要把这一带的百姓迁往陕西。金兴定三年（1219），大臣完颜伯嘉到河中，他认为河城中城为一方重镇、国家的基本所在，不应放弃河中，上奏折说：“中原之有河东，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东不雄’，万一失之，恐未易取也。”“河中、晋安（绛州）披山带河，保障关、陕，此必争之地。今虽残破，形势犹存，若使他人据之，因盐池之饶，聚兵积粮，则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他认为一旦失去河中，将会失去太行山以西的整个河东地区。金宣宗十分后悔当初放弃河中之举，下令将阿禄带拘捕下狱，命令抓紧时间修复河城中城，但后来不断被蒙古军队攻破。

从公元1218年到1222年，蒙古名将木华黎在河东各地到处征战，几乎占领了从北到南的主要城市，金人的河东屏障尽失。木华黎于金元光二年（1223）去世后，金人为为了恢复河东屏障，从1223年到1229年进行反击，收复了平阳、霍州、泽州、潞州、太原、忻州等军事重镇。金正大七年（1230）窝阔台即汗位，开始灭金总攻击，被金军收复的地方又易手到蒙古军队。

公元1222年后，河城中城在金军和蒙古军队之间数易其手。当年十月，蒙古军队在攻取荣州（今万荣县西）、临晋（今临猗县西）之后，向河城中城进攻，蒙古军队在金军河中守将侯小叔出城议事之际，攻陷河城中城。蒙古军队认为此城为河东要地，任命石天应为兵马都元帅，坐镇河中、太原、平阳等地的蒙古军队都受石天应的节制。第二年正月，侯小叔率兵从中条山出击，准备收复河城中城。石天应派遣骁将吴泽出东门，埋伏在两谷之间，企图伏击侯小叔。不料，吴泽嗜酒，夜间喝醉了，在山谷睡着了，侯小叔由小路直奔河城中城下，在城墙上挖坑登城，焚烧城楼，城中的蒙古守军仓促迎战。第二天中午，石天应战死，金军又占领了河城中城，侯小叔下令烧毁黄河上的浮桥。在这次河巾争夺战中，历史名楼鹳雀楼也被焚毁。

很快，蒙古军队十万人马又进围河中，金朝派两支援军救河中。侯小叔和援军约好，夜间鸣钲（钲，古代乐器，形似倒置的铜钟，有长柄）为号，内外呼应。到了约定的时间，侯小叔从城内出击，但城外的两支援军却不敢出击，侯小叔只好又率众回城。几天之后，河城中城又被攻陷，侯小叔战死。五月，金军又占领了河城中城。

在前后八个月的时间里，河城中城被金军和蒙古军队反复拉锯攻占，期间四次易手，这在当时极为罕见，可见双方对此地的重视，视为必争之地。

金正大八年（1231）九月，窝阔台率领蒙古大军围攻河城中，河中告急，金朝第一次派出的救援军队怯战，没有到河中就返回去了。后来金朝另外派遣一万部队救援。两位皇族——草火讹可、板子讹可领兵三万驻守河城中。因为蒙古军来势凶猛，城中守军兵力不足，只好把城内一分为二，据守半边。蒙古军队在城外建起二百尺高的松楼，又垒起土山，并挖掘100多条地道，形成地上、地下的立体攻击体系，全力向河城中进攻。城内的金军拼命抵抗，史载“军士殊死斗，日夜不休，西北楼檐俱尽”。打了两个月，蒙古军队才将河城中城攻破。

从公元1217年前后，金军第一次焚烧河城中城开始，到1231年金军彻底从河中败退，十余年间，河城中城饱受战火摧残，不但城楼被烧毁，古城附近建于北周时期的鹳雀楼和建于唐开元年间的黄河浮桥都被焚毁。鹳雀楼和黄河浮桥，对蒲州古城具有象征意义，不仅是一方之名胜，更是盛唐文化、中原文化的象征。五十年后，元代著名诗人王恽来到蒲州，慕名拜谒鹳雀楼遗迹，写了一篇《登鹳雀楼记》，不过，他所登的是鹳雀楼的遗址。他在文章中说：“……于是俯洪河，面太华，揖首阳。虽壮观委地，昔人已非，而河山之伟，云烟之胜，不殊于往古矣。”他认为，虽然没有了鹳雀楼，但这里还有“河山之伟，云烟之胜”。

在金宋战争中，因为河中的战略地位重要，金蒙双方在此争夺了十多年。河中重镇不失，金朝尚可喘息一时；一旦河中不保，金朝失去了屏障，很快就走向灭亡。

**结束语** 本版“黄河战事”专栏于10月13日开始，陆续刊发了李广洁先生撰写的11篇系列文章，介绍了数千年间发生在黄河两岸的重大战役，反映了黄河作为山西之襟带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其对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黄河战事”专栏今日结束，感谢各位读者的关注。

——编者

黄河战事